

日本古坟时代马具三则

田立坤 吕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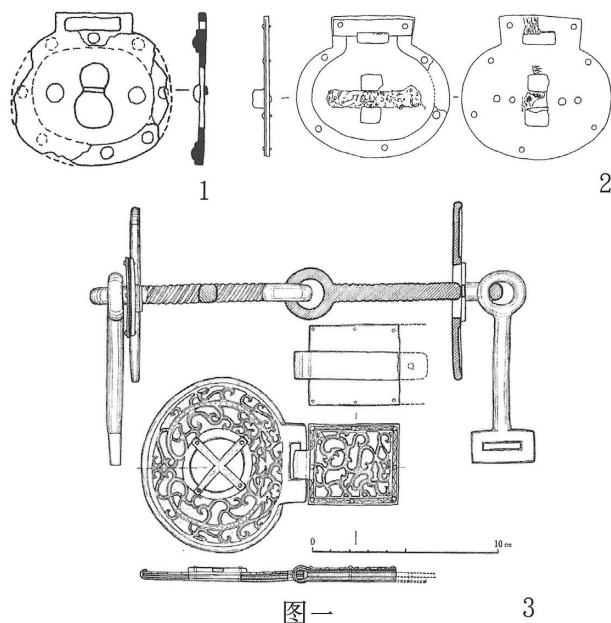
学术界普遍认为,五世纪初的日本古坟开始随葬实用马具,是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随着近年考古发现的增多,可以说,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是源自于辽西地区十六国时期的三燕文化。公元三世纪初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地区不久,即与高句丽有了接触,四世纪初,三燕文化马具即传入高句丽地区,并进而通过高句丽影响到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以至于日本列岛^[1]。兹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 镜板与立闻

日语称马镫为“镜板”,称马镫上有穿的立耳为“立闻”,这是日本最初的马具受三燕文化马具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

马镫是马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驭马,是产生最早的马具。我国最早的马镫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镫的形制多种多样,有方形、圆形、角形、S形等,质地也不限于金属,骨、角亦有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范围内除辽西三燕文化遗存外,都很少发现马镫。三燕文化和辽东高句丽遗存中马镫较多,绝大多数都是板状圆形或椭圆形的。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是朝阳十二台M9001出土的一对铁镫,圆形,附一有穿的立耳,正面周边加一圈边框,中心开孔,并置一横梁,以备穿衔(图一:1)^[2]。这种圆形镫有铜鎏金或铜鎏金雕镂龙纹的。如朝阳袁台子壁画墓^[3]、三合成征集(图一:2)^[4]、北票西沟征集^[5]、北票喇嘛洞西区II



图一
1. 十二台 M9001 出土的铁衔、镫 2. 三合成墓地出土的鎏金铜镫 3. 日本新开 1 号古坟出土的鎏金镂空铜镫

M16出土者(图版12:1)^[6]。其中喇嘛洞ⅡM16出土的背衬铁板,正面雕刻龙纹,减地镂空,周边加一圈边框,用鎏金铜钉铆合,中心穿孔置“×”形铜梁,亦用铆钉固定。通耳高15.8厘米。

日本发现时代最早的马镡出土于五世纪初的滋贺县新开1号古坟^[7]。该马镡亦是圆形,其制法是在铁衬板上先置一薄鎏金铜片,鎏金铜片上再加雕刻龙纹、减地镂空的鎏金铜板,最后再用一薄铁片将镡的背面和外缘包住(图一:3,图版12:3)。新开1号古坟出土的鎏金铜镡虽然与喇嘛洞ⅡM16出土的鎏金铜镡制法不同,但是相同之处还是很多,如都是圆形板状,附一有穿的立耳,铜鎏金,并雕镂龙纹。这种雕镂精致的圆形板状鎏金铜镡,很像是一面铜镜。可能正是因为这种附有立耳的马镡最早传入日本,因其圆形似镜,故被称作“镜板”,立耳则称为“立闻”。此后遂将与其功能相同的其它形制的如S形、F形镡也都名为“镜板”。“闻”是耳的功能,所以有穿的立耳都名为“立闻”。这种最早被名为“镜板”的圆形板状马镡,不仅在日本古坟中出现的最早,而且也是日本古坟时代最流行的一种形制。

二 鸾镡、鸾镜与鸾环

鸾铃在日本古坟时代也比较流行。马具中不论是圆形板状镜板(镡),还是F形、S形镜板(镡),多见附鸾铃者。如爱知县志段味大冢古坟出土的椭圆形鎏金铜镡上附等距的5个鸾铃(图版12:8)、福井县十善之森古坟出土的椭圆形鎏金铜镡上附4个鸾铃(图版12:7),和歌山县大谷古坟出土的F形鎏金铜镡附5个鸾铃(图版13:1),山口县上之山古坟出土的F形鎏金铜镡附7个鸾铃(图版13:2)^[8],福冈县奴山123号古坟出土的S形鎏金铜镡上附6个鸾铃(图二:1)^[9],等等。这种附鸾铃的镜板——马镡即《诗经》中所说的鸾镡。《诗经·秦风·驺铁》:“驺车鸾镡,载猷歇骄。”郑玄笺:“置鸾于镡。”《说文·鸟部》:“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鸾本为一种神鸟,可能是其“鸣中五音”的缘故,后借指一种响器——铃,亦写作鸾,也称作“鸾铃”。“置鸾于镡”即置铃于镡。上述的镡上附鸾铃与郑玄所说的“置鸾于镡”正相符合,因此附鸾铃马镡就是“置鸾于镡”的鸾镡。日本古坟时代的这种鸾镡亦是源于三燕文化马具。

1988年秋,朝阳市博物馆征集到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一批三燕文化马具资料,其中就有鸾镡一付2件^[10](图二:2),其它还有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带扣、带銙、杏叶、缀管步摇和铜鎏金镂空箭箠、鎏金铜人面及铁环首刀等,时代为四世纪初至中叶。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鸾镡为近S形,中间凸出一穿,两端各附一鸾铃,和日本福冈县奴山123号古坟出土的S形鸾镡形制十分接近。目前在三燕文化马具中发现的鸾镡仅此一例,但是鸾铃却发现的较多,单体的有北票房身墓出土的小金鸾铃^[11](图版14:1)、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的铜鸾铃^[12](图二:3),都是圆球状,空腔,内置铜丸,底部开一条形口,顶上有半圆形的穿纽。朝阳袁台子壁画墓^[13]和北票西沟等地征集^[14]的都是截顶锥状体,空腔,开4个等距的条形竖孔,内置铜丸,底部有柱状穿纽,并有圆形的伞状座(图二:4)。还有的鸾铃附于环上,如1991年北票仓粮窖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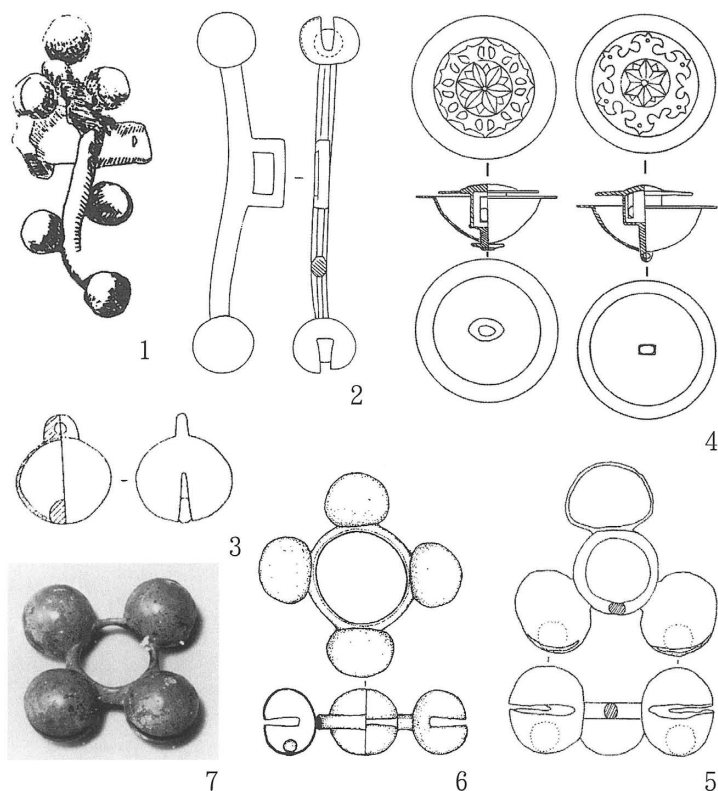
一个铜环上附3个等距的銮铃^[15] (图二:5)、1998年北票喇嘛洞II M217土的一个铜环上附4个等距的銮铃^[16] (图二:6), 铃身都是圆球状, 开一条形孔。

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坟时代遗存中, 除鸾钭(附銮铃镜板)外, 环上附銮铃的作法也比较流行。多为一环附3銮铃^[17] (图版14:3·4), 被称为“三环铃”, 也有附4銮铃者^[18] (图二:7), 与北票仓粮窖墓出土的一环附3铃、喇嘛洞II M217出土的一环附4铃形制完全相同。朝鲜半岛和日本所谓的“三环铃”也都与马具共出, 其功能是起连接作用, 也是一种马具, 因此, 其源头也应和其它马具一样, 来自于辽西地区的三燕文化。

日本古坟时代还有在镜上附铃的作法。如新沢115号古坟出土的一面铜镜的外缘上即附有5个等距的铜铃^[19] (图版14:2), 日语名之为“五铃镜”。

《诗经·小雅·信南山》:“执其銮刀, 以启其毛, 取其血背。”孔颖达疏:“鸾即铃也, 谓刀环有铃, 其声中节。”汉代以前考古发现中常见的铃首器, 即有刀柄端附铃者, 所谓“刀环有铃”可能即指此类铃首刀而言。“刀环有铃”的铃首刀谓之鸾刀, “置鸾于钭”的钭谓之鸾钭, 依此例, “置铃(鸾)于环”应谓之鸾环, “置铃(鸾)于镜”的镜应谓之鸾镜。那么, 所谓的“三环铃”可名为“鸾环”, “五铃镜”可名为“鸾镜”。

日语称附五个铃的镜为“五铃镜”, 这种命名方式也符合汉语的命名原则: 由“五”、“铃”、“镜”三个语素构成有两个层次的偏正型合成词——“五铃镜”, “五铃”修饰“镜”, “五”修饰“铃”。专指考古上所见的那种“附五个铃的镜”。依此类推, “附三个铃的环”名为“三环铃”则不合逻辑, 或雅称为“鸾环”, 或据实际结构俗称为“三铃环”均可, 惟其不能名为“三环铃”。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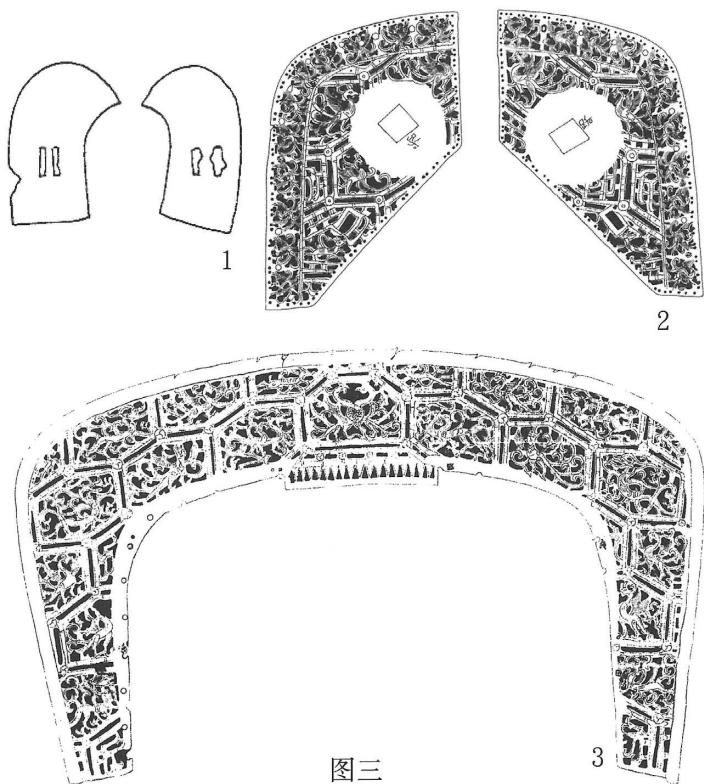
1. 日本奴山 123 号古坟出土的鸾钭
2. 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鸾钭
3. 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出土的铜銮铃
4. 北票征集的铜銮铃
5. 仓粮窖墓出土的三环铃
6. 喇嘛洞 II M217 出土的四铃环
7. 日本小田茶臼冢古坟出土的四铃环

三 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的产地

1985年在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鳩町藤之木古坟出土了包括有鞍具、镡、镫、杏叶等成套的铜鍍金马具^[20]。关于这套铜鍍金马具的原产地，目前大体有四种意见：A、产于中国南朝萧梁，即长江下游地区；B、产于萧梁而后经百济加工改造；C、产于新罗，即朝鲜半岛南部；D、产于中国北魏的东部地区，先传入辽东高句丽，再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最后经百济传入日本^[21]。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辽西地区三燕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具实物资料。其中有用于控制马的衔、镡，用于骑乘的鞍、镫及固定鞍、镫用的带扣，用于装饰的当卢、銮铃、杏叶、摇叶、寄生等。鞍桥包片都较宽大，且前桥略小于后桥，参考同时代的长沙西晋永宁二年陶马鞍、南京象山7号墓陶马鞍、锦州前山前燕墓陶马鞍，可知这类鞍都是两桥直立的垂直高桥型。镫均属长柄型，或铜铸板状，或木芯外包鍍金铜皮和外包皮革。镡以椭圆形板状者居多，也有角形镡和鸾镡。带扣绝大多数是单梁型，即由“U”形扣环和置于开口处连接革带、安装扣舌的横梁构成(图四:1~3)。装饰纹样有龟背纹、对凤纹、龙纹、凤纹、忍冬纹等，流行金属摇叶装饰和鍍金、錾刻、镂孔等工艺技术。上述特点大都被四世纪以后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伽耶及日本的马具所继承、发展。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铜鍍金马具也不例外，如前桥略小于后桥

的铜鍍金鞍桥包片，包片上雕镂的龟背纹、杏叶上的对凤纹、雕镂龙纹的椭圆形马镡、金属摇叶装饰等及鍍金、錾刻、镂孔工艺技术，都与三燕文化马具风格一脉相承(图版9:4, 12:6, 13:3)。因此，随着新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日本古坟时代马具的来源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一致性意见。“慕容鲜卑的马具在四世纪的东亚地区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从大的系统来说，东亚诸国的马具皆与慕容鲜卑的马具有亲缘关系，皆属同一系统。他们多是在慕容鲜卑马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2]即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主要来自于我国大陆，具体路径是四世纪初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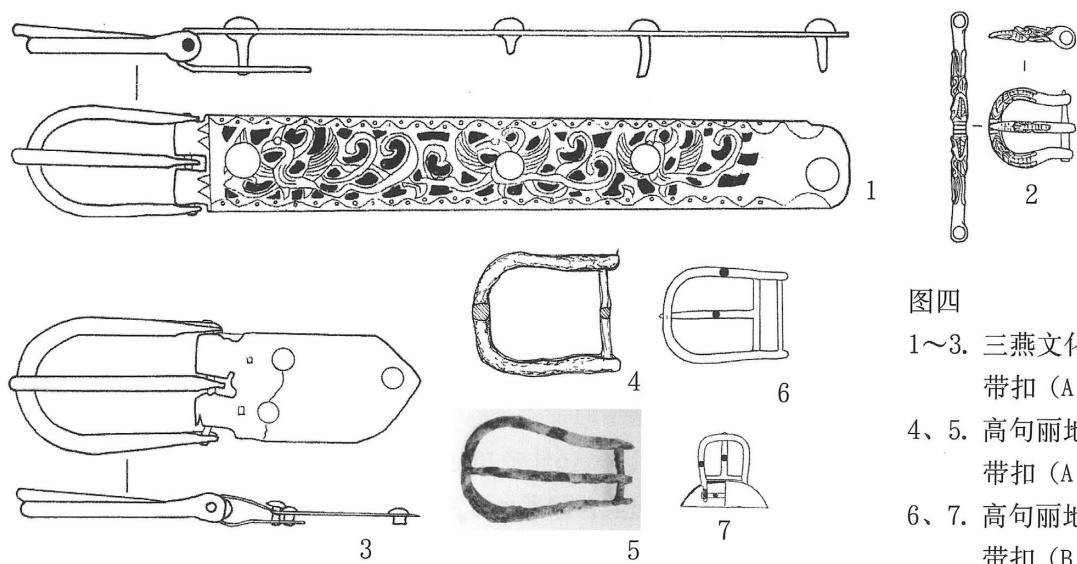
图三

十二台 88M1 出土的铜鍍金镂孔翼形片、鞍桥包片 (1/5)

由辽西地区的慕容燕传入辽东的高句丽，并通过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的新罗、百济、伽耶地区，五世纪初再经由朝鲜半岛南部传入日本。由此看来，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马具既然非日本本土所产，那么当是产于慕容燕治下的辽西地区、或是辽东高句丽和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伽耶地区，而不会产于南朝萧梁或其他地区。

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铜鍍金马具与辽西三燕文化马具(即所谓的“慕容鲜卑马具”)虽然同出一源，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辽西三燕文化马具的翼形片为形状相同、方向相反的两片对称置于鞍桥内缘下(图三:1·2)，而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的翼形片(矢金具)已成为一体(参见图版9:4)，与三燕文化马具的翼形片相比体量也变得窄小。辽西三燕文化马具中，与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鞍具形制相同的鞍桥包片都在拱正中置一个大的变形六角龟背纹，内置交颈对凤纹，两侧的龟背纹以此为轴向外连续展开，内置纹样也左右相同(图三:3)，布局严谨，对称工整。而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鞍桥包片的后桥在正中置把手(前桥此部位残毁不清)，且两侧的龟背纹及内置纹样亦不求对称。就纹样的内容而言，辽西三燕文化马具的装饰纹样除交颈对凤纹、衔胜对凤纹外，还有忍冬纹、龙纹、凤纹、怪兽纹，而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的装饰纹样除龙、凤外，还有狮子、象等，比三燕文化马具纹样要复杂得多；在制作工艺方面，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除采用了鑿刻、镂孔技法外，还采用了浮雕、玻璃镶嵌等技术。上述比较表明，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与三燕文化铜鍍金马具的各自特点，反映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异。所以，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也不会是三燕文化的产物。

关于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的年代和产地，苏哲先生通过对其纹样组合、源流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认为“藤之木马具的纹饰组合应与北魏晚期的历史、宗教、艺术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鞍勒、障泥、杏叶等主要部件可能为北魏东部地区的制品，年代上限为孝文帝以后，下限可至北魏灭亡(534年)。”^[23]



图四
1~3. 三燕文化的带扣(A型)
4、5. 高句丽地区带扣(A型)
6、7. 高句丽地区带扣(B型)

既然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的时代为孝文帝以后,即六世纪初,那么它绝不会是辽西地区的产品。北魏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不久在龙城设营州昌黎郡,直至北魏灭亡。随着政权的更迭,北魏营州昌黎——昔日的三燕龙城已非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辽西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具三燕文化特征的铜鍍金马具、金步摇及金属摇叶装饰完全不见了。因此,从大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北魏时的辽西地区制造出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那样雕镂精致、纹样内容丰富的铜鍍金马具是不可能的,此其一。其二,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中的带扣具有十分明确的地域特征,同样表明它不可能是辽西地区的制品。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流行两种形制的带扣。A型:呈“U”字形扣环,在开口处置一横梁,用以连接革带及安装扣舌(参见图四:1~3)。B型:亦是“U”字形扣环,开口处横梁仅用于连接革带,在横梁里侧另置一轴,与扣舌连为一体,呈“T”字形(图四:6·7)。这两种带扣的主要区别在于革带和扣舌不是安装在同一位置,A型的革带和扣舌都安装在扣环开口处的横梁上;B型扣环开口处的横梁上仅连接革带,而呈“T”字形的扣舌则置于横梁里侧。这两种带扣的分布区域大体以辽河为界。A型主要流行在辽西三燕文化分布区,如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及河南安阳孝民屯前燕墓出土的带扣,在朝阳三合成、北票喇嘛洞征集的三燕文化带扣,都属这种形制。B型主要流行在高句丽遗存中,如辽宁桓仁五女山、将军墓、抚顺高尔山、吉林集安等地高句丽遗址、墓葬出土的带扣大都属于B型^[24]。毫无疑问,两种带扣的产地应在各自的主要流行区域内。

由于辽西慕容燕与高句丽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即已发生了频繁的军事冲突和政治、文化交往,因此这两种带扣也有交叉分布的现象。A型带扣在高句丽地区乃至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都有的分布(图四:4·5、图版10-4)。B型带扣在辽西三燕文化遗存中也有发现,但是极为少见,目前见于报道的仅有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的2件形制相同的银带扣属于B型(图版14:7)。袁台子壁画墓属“石板搭盖石室墓”,与当时辽西地区流行的梯形土坑竖穴木棺墓、梯形石椁木棺墓区别明显,而与辽阳地区的汉魏壁画墓一脉相承。因此,根据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分析,袁台子壁画墓是被慕容鲜卑徙往辽西棘城的辽东大姓遗存^[25],辽东地区与高句丽接壤,因此,把该墓出土的以往不见于辽西地区的B型银带扣,视为一种偶然所致,大概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吧。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散见于高句丽、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A型带扣,其中大部分属于三燕旧物,不排除有少数是产于当地的可能。但是,偶见于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中的B型带扣则绝非辽西地区所产,当产于高句丽地区无疑。

藤之木古坟的铜鍍金马具中,在前桥的“矧金具”即翼形片上附有用于连接攀胸的带扣2件、后桥的“矧金具”上附有用于连接鞅带的带扣4件。上述带扣都属B型(参见图版9:4),不论从体量还是工艺等方面观察,都可以认定,这6件带扣与所附着的矧金具及鞍金具是浑然一体而非一种临时的搭配。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不是有意而为,是不会在辽西地区制造的鞍具上配上高句丽地区产的带扣。所以,藤之木古坟的铜鍍金鞍具只能是产于B型带扣的流

行区域内。

综上所述，附着B型带扣的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不能产于A型带扣的流行区域，而只能产生于B型带扣的流行区域内，即高句丽地区或朝鲜半岛，而不会是其它地区。此时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从丸都，即今吉林集安转移到朝鲜半岛的平壤。而以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制作工艺之精美、装饰之华丽，肯定是王谢堂前之燕，绝非寻常百姓之物，因此也绝不会是高句丽旧都的产物，只能是产于高句丽的新都平壤。

为了争夺辽东地区，高句丽与辽西地区的慕容燕曾发生过多战，三燕文化马具也随之影响到高句丽。尤其是五世纪初，慕容燕国势渐弱，在与周边的政治交往、军事冲突中处于守势，辽东地区亦为高句丽所有。太延二年(436年)，北魏灭北燕前夕，高句丽大军开进龙城，龙城库府所藏尽为高句丽所有，冯弘和龙城民户亦被徙往辽东，其中当不乏掌握马具制作技术的龙城工匠在内。所以，随北燕的灭亡而在辽西消失的铜鍍金马具、金属摇叶装饰等才能在辽东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得以继续流行。北燕灭亡后，高句丽直接与北魏为邻，聘使往来不绝于途，“不仅在政治、外交方面，而且文化、宗教甚至民族血缘上都与北魏有着深刻联系。”

^[26]北魏对高句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平壤作为乐浪故地，自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设四郡至公元313年高句丽占领西北朝鲜，一直是汉文化占统治地位，即便是被高句丽占领之后，汉文化传统也仍然是根深蒂固。平壤附近大批汉魏晋时期的木椁墓、砖室墓及其随葬品的发现也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因此，无论是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还是具体的个案比较，平壤都具备产生藤之木古坟铜鍍金马具的条件，所以说该马具产于高句丽新都平壤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

以上几例说明，辽西地区的三燕文化通过高句丽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伽耶影响到日本列岛，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与三燕文化马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是，源于三燕文化，在日本古坟中较常见的鸾钭、鸾环(三铃环)却不见于高句丽遗存中，鸾钭亦不见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伽耶遗存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注 释

- [1] 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11期。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11期。
- [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6期。
- [4] 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文物》1997年11期。
- [5] 同[1]。
-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2002，57页46。
- [7] [日本]滋贺县教育委员会：《滋贺县史迹调查报告》第十二册，1961，50页第二八图。
- [8] 日本马具大鉴编辑委员会：《日本马具大鉴一·古代上》，日本中央競马会发行，1990年。
- [9] 此件标本是笔者1998年参观日本福冈时所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334页图八：2是据照片摹画。
- [10] 同[1]。
- [11]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1期。
- [13] 同[3]。
- [14] 同[1]。
- [15] 孙国平、李智：《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文物》1994年11期。
- [1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2期。
- [17] 同[8]。
- [18] [日本]石山勲：《关于九州出土的环铃》，《古代探丛——滝口宏先生古稀纪念考古学论集》，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0年。
- [19]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大和的考古学》，1999年。
- [20]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斑鸠藤之木古坟概报》，吉川弘文馆，1989年。
- [21] 苏哲：《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纹饰初探》，《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关于A、B、C三种观点亦是来自苏哲先生的引述。
- [22] 王巍：《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考古》1997年12期。并参见A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9期。B董高《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10期。C田立坤《三燕文化与高句丽考古遗存之比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 [23] 同[21]。
- [24] 田立坤：《论带扣的型式及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1期。注[22]C。
- [25] 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再认识》，《文物》2002年9期；《三燕文化墓葬类型与分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6] 同[21]。

插图出处:

图一: 1.《文物》1997年11期15页图三一:1, 2.《文物》1997年11期45页图八:1, 3.《滋贺县史迹调查报告》第十二册50页第二八图

图二: 1.《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334页图八:2。此图系笔者根据在福冈参观时所拍照片摹写。2.《文物》1994年11期24页图一三:1、图一四, 3.《文物》1997年11期25页图一三:3, 4.《文物》1994年11期23页图一〇:1、2, 5.《文物》1994年11期40页图七:4, 6.《考古学报》2004年2期230页图二二:3, 7. 甘木市教育委员会《小田茶臼冢古坟》图版二五:3

图三: 1、2.《文物》1997年11期27页图二〇:3、图二二, 3.《文物》1997年11期28页图二五

图四: 1~3.《文物》1994年11期25页图一七:1、3, 34页图二:3, 4、5.《丸都山城》94页图五一:5,《五女山城》图版五三: 9, 6、7.《考古》1979年1期30页图六:7、18

日本古墳時代の馬具三題

田立坤 呂学明

日本の古墳において、5世紀初めに実用的な馬具を副葬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外来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た結果、というのが学界の共通認識になっている。近年、考古学的発見の増加により、日本の古墳時代の馬具の源流は、遼西地域十六国時代の三燕文化とも考えられる。西暦3世紀初め、慕容鮮卑が遼西地域に侵入すると、ほどなく高句麗との接触が生じて、4世紀初めには、三燕文化の馬具は高句麗に伝播し、そして高句麗を経て朝鮮半島南部や、さらに日本列島にまで影響を及ぼした¹。以下、いくつか例を挙げて説明する。

一 鏡板と立聞

日本語で鐙のことを「鏡板」といい、鐙の頂部の有孔突出部を「立聞」と称す。これは日本最古の馬具が、三燕文化の馬具の影響を受けたことの明らかな証拠である。鐙は馬具の重要な構成部であり、馬を御するために用い、最も古くから作られた馬具である。中国最古の鐙は河南省安陽殷墟で発見された。形状は、正方形、円形、多角形、S字形など多種多様で、材質も金属に限らず、骨、角など様々である。

魏晉南北朝時代、遼西地域の三燕文化の遺物を除き、鐙の発見事例は、全国規模で見ても極めて少ない。三燕文化と遼東の高句麗の遺物には鐙が比較的多く、その大多数が板状円形もしくは楕円形をしている。現時点で最も古いのは、朝陽十二台M9001で出土した一対の鉄製鐙で、円形を呈し、頂部に穴を開けた立聞があり、表面は周縁に縁金を重ね、中心部は開孔し、銜を繋ぐために一本の横梁を通して²(図一-1)。こうした円形鐙には、朝陽袁台子壁画墓³、三合成収集⁴(図一-2)、北票西溝収集⁵、北票喇嘛洞西区ⅡM16の出土品⁶(図版12-1)のように、金銅製あるいは龍文を透彫にした金銅製のものがある。このうち喇嘛洞西区ⅡM16で出土した鐙では、裏に鉄板を当て、表面には龍文を彫り、透彫をおこない、周辺には縁金を重ね、金銅製の鋏で留めている。中央の穴に「×」字形の銅製梁を通し、鋏で固定している。全高は15.8cmである。

日本で発見された最古の鐙は、5世紀初めの滋賀県の新開1号墳⁷で出土した。この鐙も円形で、その作り方は、鉄の地板に一枚の薄い金銅板を張り、その上に龍文を彫って透彫にした金銅板を重ね、最後にまた一枚の薄い鉄板で鐙の裏面と外縁を包み込む(図一-3、図版12-3)。新开1号墳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鐙は、喇嘛洞ⅡM16で出土した金銅鐙の作り方とは異なるが、ともに円形板状であり、穿孔のある立聞が付き、金銅製であり、また龍文を彫って透彫にするなど、共通点も多い。こうした精緻な彫刻が施された円形板状の金銅製鐙は、一面の銅鏡のようである。おそらくこのような立聞のある鐙が最も初期に日本に伝来し、その円形が鏡と似ていたことから「鏡板」と呼ばれ、立耳を「立聞」と称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ろう。この後、機能が同じS字形やF字形などの他の形状の鐙も、すべて「鏡板」と呼

ばれるようになる。「聞」は耳の機能であるから、穴のある立耳は「立聞」となる。この種の最初に「鏡板」と命名された円形板状鑣は、日本の古墳で最も早く出現しただけでなく、古墳時代に最も盛行した形式である。

二 鸞鑣、鸞鏡と鸞環

鸞鈴は日本の古墳時代に比較的流行した。馬具では、円形板状鏡板(鑣)、またf字形、S字形鏡板(鑣)のいずれにも、鑣鈴があるものが多く見られる。たとえば愛知県志段味大塚古墳から出土した楕円形銅製鑣には等間隔で5個の鑣鈴がついており(図版12-8)、福井県十善之森古墳で出土した楕円形金銅製鑣には4個の鑣鈴(図版12-7)、和歌山県大谷古墳出土のf字形金銅製鑣には5個の鑣鈴(図版13-1)、山口県上之山古墳のf字形銅製鑣には7個の鑣鈴⁸(図版13-2)、福岡県奴山123号古墳のS字形銅製鑣には6個の鑣鈴⁹(図二-1)、などである。このような鑣鈴付きの鏡板、つまり馬鑣は『詩経』に言う鸞鑣である。『詩経・秦風・駟鉄』に、「駟車鸞鑣、載猷歇驕(狩りの車の鸞鑣(鈴)の音がなり、獵犬を車にのせる)」とあり、鄭玄の注釈には、「鸞を鑣に置く」とある。また『説文・鳥部』では「鸞は、赤*神霊の精なり。赤色にして五彩あり、雞の形をしており、鳴けば五音に中る、高揚した声が出ると、則ち至る。」との記載がある。鸞は元来一種の神鳥であって、その「鳴けば五音に中る」と言われる鳴声のためか、後に鳴り物の一種、つまり鈴を意味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た鑣と書くようになり、「鑣鈴」と呼ぶようにもなった。「鸞を鑣に置く」とは、鈴を鑣に置く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上述の鑣に鑣鈴を付ける、という表現は、鄭玄の注釈に言う「鸞を鑣に置く」と完全に一致する。したがって、鑣鈴付きの鑣とは「鸞を鑣に置く」の鸞鑣である。日本の古墳時代のこうした鸞鑣もまた三燕文化の馬具に由来する。

1988年秋、朝陽市博物館は北票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三燕文化の馬具資料を採取した。そのなかに鸞鑣が1組2点(図二-2)あり¹⁰、そのほか金銅製透彫鞍金具、鉸具、帯金具、杏葉、綴管歩揺と金銅製透彫胡籥、金銅製人面飾金具および鉄素環頭大刀などが含まれ、時期は4世紀初頭から中葉のものである。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鸞鑣はS字形に近く、中間部が突出し、孔が一つ開いている。両端に鑣鈴がそれぞれ1個付いていて、福岡県奴山123号古墳で出土したS字形鸞鑣と形や作りがかなり類似する。これまでに三燕文化の馬具で発見された鸞鑣はこの1例にとどまるが、鑣鈴は比較的多数が発見されている。単体では北票房身墓で出土した金製小鑣鈴¹¹(図版14-1)、朝陽十二台鄉磚廠88M1で出土した銅製鑣鈴¹²(図二-3)があり、いずれも球形、中空で、内部に銅製の丸が入っている。底部に条孔を入れて開口し、頂部には穴の開いた半円形の鈕が付いている。朝陽袁台子壁画墓¹³および北票西溝などで採取されたもの¹⁴は、いずれも截頭円錐形で中空、縦長の条孔が等間隔に4つ開き、内部に銅製の丸があり、底部に柱状の鈕があり、さらに円形の笠状の座がある(図二-4)。さらには、鑣鈴が環に付けられたものがある。例えば1991年に北票倉糧窖で出土した例では、銅製の環に鑣鈴が等間隔で3つ並んでおり¹⁵(図二-5)、1998年北票喇嘛洞ⅡM217で出土した例では、銅製の環に鑣鈴が等間隔で4つ並び¹⁶(図二-6)、鈴は円球状で条孔を開ける。

朝鮮半島と日本列島の古墳時代の遺物では、鸞鑣(鑣鈴付鏡板)以外に、環に鑣鈴を付けるやり方も比較的流行した。その多くが1環に3個の鑣鈴を付け¹⁷(図版14-3・4)、「三環鈴」と呼ばれ、また4個の鑣鈴を付けたもの¹⁸(図二-7)もあり、北票倉糧窖墓出土の3鈴が付いた環や喇嘛洞ⅡM217出土の4鈴が付いた環の形やつくりと全く同じである。朝鮮半島と日本列島のいわゆる「三環鈴」もまた、いず

れも馬具と共に出土し、互いに連結機能があって、やはり馬具の一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その源流もその他の馬具と同様、遼西地域の三燕文化と考えられる。

日本の古墳時代には、さらに、鏡に鈴を付けたものもあった。例えば、新沢115号墳から出土した銅鏡の外縁には、等間隔に5個の銅鈴が付けられている¹⁹ (図版14-2)。日本ではこれを「五鈴鏡」という。

『詩経・小雅・信南山』には、「その鸞刀を手に執って、その(犠牲牛の)毛をかき分け、その血と脂とをとる」という記述がある。孔穎達の注釈によると、「鸞はつまり鈴である。鈴がある刀環をいう。その音は中節」とある。漢代以前の考古学的発見でよく見られる鈴首器、つまり柄の端に鈴が付いた刀、いわゆる「刀環有鈴」とは、おそらくこうした鈴首刀を指したのであろう。また「刀環有鈴」の鈴首刀は鸞刀といわれ、「鸞を鑣に置く」の鑣は鸞鑣という。この例に従うと、「鈴(鸞)を環に置く」ものは鸞環と呼び、「鈴(鸞)を鏡に置く」鏡は鸞鏡と呼んだはずである。」とすれば、いわゆる「三環鈴」は「鸞環」、「五鈴鏡」は「鸞鏡」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日本語で5個の鈴がついた鏡を「五鈴鏡」と称すが、このような命名方式は、中国語の命名原則とも合致する。「五」、「鈴」、「鏡」の3つの語素は、二層の修飾型合成語——「五鈴鏡」を構成しており、「五鈴」は「鏡」を修飾し、「五」は「鈴」を修飾する。考古学上で見られるこのような「5個の鈴がついた鏡」を指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3個の鈴がついた環」を「三環鈴」とするのは、論理に合わないことになる。正しく「鸞環」と呼ぶか、あるいは実際の構造に基づいて「三鈴環」と通称するのはよいが、「三環鈴」と呼ぶことはできない。

三 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の生産地

1985年、日本の奈良県生駒郡斑鳩町の藤ノ木古墳から、鞍金具、鑣(鏡板)、鎧、杏葉等を含む金銅製馬具一式²⁰が出土した。この金銅製鞍金具の原産地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大別すると4通りの説がある。A：中国南朝の蕭氏の梁、即ち長江下流地域で生産されたもの、B：梁で生産されてから百済で加工されたもの、C：新羅すなわち朝鮮半島南部で生産されたもの、D：中国北魏の東部で生産されてから、まず遼東高句麗に入り、次いで朝鮮半島南部の百済に渡り、最後に百済を経て日本に伝来したもの²¹。

前世紀の70年代以降、遼西地域三燕文化の墓葬から大量の馬具の実物資料が出土した。そのなかには、馬を御するための銜、鑣、乗馬に用いる鞍や鐙、および鞍や鐙を固定する鉸具、装飾用の当盧(馬面)、鑾鈴、杏葉、步揺、寄生などがある。鞍金具はいずれも比較的幅が広くて大きく、前輪が後輪よりやや小さい。同時代の長沙西晋永寧二年の馬俑の鞍、南京象山7号墓の馬俑の鞍、錦州前山前燕墓の馬俑の鞍を参考にすると、こうした鞍はいずれも前輪と後輪が直立した垂直高橋型鞍である。鐙はいずれも長柄型で、銅鑄製の板状、あるいは木芯で外側を金銅製板か皮革で包む形状である。鑣は楕円形板状のものが多く、多角形の鑣と鸞鑣も見られる。鉸具は大多数が単梁型、つまり「U」字形の縁金と、革帯と接続する開口部、刺金を取り付ける横梁から構成される(図四-1~3)。装飾文は亀甲文、対鳳文(向かい合う鳳凰文)、龍文、鳳凰文、忍冬文などがあり、金属步揺装飾や鍍金、タガネ彫、透彫などの工芸技術が流行した。上記の特徴の大部分は、4世紀以降の高句麗、新羅、百済、伽耶および日本の馬具に継承され発展を見た。藤ノ木古墳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馬具も例外ではなく、例えば、前輪が後輪よりやや小さい金銅製鞍金具、鞍金具の透彫亀甲文の彫刻、杏葉に施した対鳳文、龍文を透彫彫刻した楕円形鑣、

金属歩揺装飾等、および鍍金、タガネ彫、透彫などの工芸技術は、すべて三燕文化の馬具の様式と同じである(図版9-4、12-6、13-3)。そこで、新たな考古学資料が次々と発見され研究が進むにつれて、日本の古墳時代の馬具の源流について、比較的明確で一致した意見が出てきた。「慕容鮮卑の馬具は4世紀の東アジアでは先進的な地位を占めていた。大きな系統で見れば、東アジア諸国の馬具は、みな慕容鮮卑の馬具と緊密な関係があり、同一系統に属する。それら馬具の多くは、慕容鮮卑の馬具を基礎にして発展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²²。つまり日本の古墳時代の馬具は、主として中国大陆から伝来し、その具体的な経路は、4世紀初頭、遼西地域の慕容氏の燕から遼東の高句麗に流入し、高句麗を経て朝鮮半島南部の新羅、百済、伽耶地域に至り、それが5世紀初頭に朝鮮半島南部を経由して日本に入ってきた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見ていくと、藤ノ木古墳から出土した馬具は、日本本土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慕容氏の燕の統治下の遼西地域、あるいは遼東の高句麗や朝鮮半島南部の新羅、百済、伽耶地域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り、南朝の蕭氏の梁やその他の地域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はありえないと思われる。

藤ノ木古墳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馬具と遼西三燕文化の馬具(いわゆる「慕容鮮卑馬具」)は源流を同じくするが、大きな違いもある。遼西三燕文化の馬具の翼形装飾金具は、形状は同一で方向は反対向きの二つの金具が左右対称に鞍金具の内縁の下に置かれるが(図三-1・2)、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の翼形装飾金具(磯金具)は、左右が繋がって一体となっており(図版9-4参照)、三燕文化の馬具の翼形装飾金具に比べると小さくなっている。遼西三燕文化の馬具の中で、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鞍金具と形状や作りが同じ鞍金具は、いずれもアーチ形の中央に大きな変形六角亀甲文があり、その内部に交頸対鳳文を配し、両側の亀甲文がこれを軸として外側に連なって展開している。内側の文様も左右同形(図三-3)で、配置は精密、左右対称である。一方、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鞍金具の後輪は、中央部に把手があり(前輪の当該部位は残存せず不明)、かつ両側の亀甲文および内側の文様が非対称である。文様の内容について言えば、遼西三燕文化の馬具の装飾文様は、交頸対鳳文、銜勝対鳳文以外に、忍冬文、龍文、鳳凰文、怪獣文があるが、藤ノ木古墳で出土した馬具の装飾文様は、龍や鳳凰以外にも、獅子、象などがあり、三燕文化の馬具の文様よりもさらに複雑である。製作技法面でも、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はタガネ彫、透彫といった技法以外に、浮彫り、ガラス象嵌などの技術を用いている。上記の比較から、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と三燕文化の金銅製馬具のそれぞれの特徴には、両者の間に存在する時代的・地域的な違いが反映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は、三燕文化の地で生産されたものではありえ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の年代と製作地に関して、蘇哲氏は、その文様の組み合わせや源流について精緻な比較研究を行い、「藤ノ木古墳の馬具の装飾文様の組み合わせは、北魏後期の歴史、宗教、芸術環境と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る。鞍と轡、障泥、杏葉などの主要部品は、おそらく北魏東部地域の製品であり、年代の上限は孝文帝以降、下限は北魏滅亡(534年)まで」との見解²³を示している。

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の時代が孝文帝以降、即ち6世紀初めである以上、遼西地域の製品ではあり得ない。北魏は太延2年(436年)に北燕を滅ぼし、ほどなく龍城に営州昌黎郡を設け、その後北魏は滅亡した。政権の変遷に伴い、北魏営州昌黎郡——かつての三燕龍城はすでに東北地区の政治文化の中心ではなく、遼西地域の考古文化の様相もまた根本的な変化を生じ、三燕文化の特徴を最も備えた金銅製馬具や金製髪飾りおよび金属製歩揺といった装飾も完全に見られなくなった。このため、政治・文化的背景から見ると、北魏時代の遼西地域では、藤ノ木古墳で出土したような精緻な彫刻や多様な文様が盛り込まれた金銅製馬具を製作するのは不可能とするのが第一点である。第二点としては、藤ノ木古墳の

金銅製馬具の鉸具には、明らかな地域的特徴があり、同じく遼西地域の製品ではありえない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西暦3世紀から6世紀にかけて、東北地区および朝鮮半島では、2種類の鉸具が流行した。A型は、「U」字形の縁金で、開口部に横梁を設け、革帯を連結し、刺金を付けるものである(図四-1～3参照)。B型もまた「U」字形の縁金であるが、開口部の横梁は革帯を連結するだけで、その内側にもう一軸が設けられ、刺金と一体となって、T字形を呈する(図四-6・7)。この2種類の鉸具の主要な区別は、革帯と刺金が同じ位置に取り付けられていない点にあり、A型の革帯と刺金は、どちらも縁金の開口部の横梁に取り付けられており、B型の縁金の開口部の横梁には革帯が連結するのみで、T字形の刺金は横梁の内側に設けられている。この2種類の鉸具が分布する地域は、概ね遼河を境界としている。A型は主として遼西三燕文化の分布地域で盛行し、朝陽十二台鄉磚廠88M1、朝陽前燕奉車都尉墓および河南安陽孝民屯前燕墓で出土した鉸具、朝陽三合成、北票喇嘛洞で収集した三燕文化の鉸具などは、いずれもこの種の形状や作りに属する。B型は主として高句麗の遺物に見られ、遼寧桓仁五女山、將軍塚、撫順高爾山、吉林集安などの高句麗の遺跡や墓葬で出土した鉸具の多くがB型に属する²⁴。2種類の鉸具の製作地が、それぞれが盛行していた地域内にあることは、疑問の余地がない。

遼西の慕容氏の燕と高句麗は、すでに3世紀以来、頻繁に軍事衝突や政治、文化的交流があったことから、この2種類の鉸具も交叉して分布する現象が生じた。A型鉸具は高句麗地域から朝鮮半島および日本列島のすべてで分布している(図四-4・5、図版10-4)。B型鉸具は遼西三燕文化遺跡でも発見されているが、極めて少なく、現在報告で見られるのは、わずかに朝陽袁台子壁画墓出土の同じ形状や作りをした2点の銀製鉸具のみがB型に属する(図版14-7)。袁台子壁画墓は「石板搭蓋石室墓」に属し、当時遼西地域で流行していた梯形土坑竖穴木棺墓や梯形石槨木棺墓との違いは明らかで、遼陽地域の漢・魏壁画墓と同じ流れを汲む。このため、墓葬の形態や造り、壁画内容の分析に基づく、袁台子壁画墓は、慕容鮮卑によって遼西棘城に移住させられた遼東の主要な氏族が残したものである²⁵。また、遼東地域と高句麗は国境を接している。それゆえ、袁台子壁画墓から出土した、遼西地域では以前に見られなかったB型銀製鉸具を、偶然の例外とみなすのも、あながち無理なこじつけではないであろう。

現在の考古学的発見と上記の分析から、高句麗、朝鮮半島および日本列島で散見されるA型鉸具のうち、大部分は三燕からの伝来品であるが、一部は現地で製作された可能性を排除できないと思われる。ただし、朝陽袁台子壁画墓でたまたま発見されたB型鉸具は、遼西地域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高句麗地域で製作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まず間違いない。

藤ノ木古墳で発見された金銅製馬具の中に、前輪の「磯金具」、即ち翼形装飾金具に付いた胸繫と繋ぐ鉸具(鞍金具)2点と、後輪の「磯金具」に付いた尻繫と繋ぐ鉸具(鞍金具)4点がある。上記の鉸具はいずれもB型に属している(図版9-4参照)。大きさや技法などの面から見て、これら6点の鉸具と付属の磯金具および鞍金具は、渾然一体となっており、一過性の組み合わせでないと考えられる。従って、当時、意図的に行ったものでもない限り、遼西地域で製作された鞍に高句麗地域で作られた鉸具を組み合わせたとは想像しがたい。したがって、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鞍金具は、B型鉸具が流行していた地域で作られたとするしかない。

以上のことから、B型鉸具の付いた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は、A型鉸具の流行地域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B型鉸具の流行地域でのみ、即ち高句麗地域あるいは朝鮮半島でのみ作られ、他の地域ではあり得ないはずである。この時期、高句麗の政治・経済・文化の中心は、すでに丸都、つまり、今の吉林省集安から朝鮮半島の平壤に移っていた。また、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の技術の高さと装飾の華麗

さは、「王謝堂前燕」**であり、決して「尋常百姓家」**のものではない。したがって、高句麗旧都の製品ではなく、高句麗の新都平壤の製品としか考えられない。

高句麗と遼西の慕容氏の燕は、かつて遼東地域を巡って度重なる争奪戦を繰り広げてきた。この影響を受けて、三燕文化の馬具もまた高句麗に伝播した。特に5世紀初頭、慕容燕の勢力が弱まり、周辺諸国との政治的な交際や、軍事衝突で守勢となっていたことから、遼東地域は高句麗の領有するところとなっていた。太延2年(436年)、北魏が北燕を滅亡させる直前、高句麗の大軍が龍城に侵入し、龍城の倉庫の所蔵品をことごとく奪い尽くし、燕王馮弘やその他龍城の住民を遼東に連れ去ったが、その中には馬具製作技術を持った龍城の工人たちも相当数含まれていた。こうして、北燕の滅亡に伴い、遼西地域で途絶えた金銅製馬具、金属歩揺などの装飾品の製作能力は、遼東あるいは朝鮮半島、日本列島に引き継がれて盛行を見たのである。北燕の滅亡後、高句麗は直接に北魏の隣国となり、絶えず使節が往来した。「政治、外交面だけでなく、文化、宗教、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民族的血縁関係においても北魏と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った」²⁶。北魏の高句麗に対する影響の大きさは明らかである。そのうえ、平壤は漢の楽浪郡の故地であり、漢の武帝が元封3年(紀元前108年)に四郡を設置してから、西暦313年に高句麗が西北朝鮮を占領するまで、一貫して漢文化は支配的な地位にあった。つまり、高句麗に占領された後も、漢文化の伝統は依然として深く根ざしていたのである。平壤付近にある漢・魏・晋時代の木槨墓、磚室墓および副葬品の発見もまた有力な考古学的証拠をもたらした。このため、大きな歴史文化背景から分析しても、具体的な個別事案を比較しても、平壤は藤ノ木古墳の金銅製馬具製作地の条件を備えており、したがって、この馬具は高句麗の新都平壤で作られた可能性が最も高い。

以上のいくつかの例は、遼西地域の三燕文化が高句麗および朝鮮半島南部の新羅、百済、伽耶を通じて日本列島に影響を与え、また、日本の古墳時代の馬具と三燕文化の馬具には、密接な淵源的関係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ただし、三燕文化に源を発するものでも、日本の古墳によく見られる鸞鑣、鸞環(三鈴環)は高句麗の遺物には見られず、また鸞鑣は朝鮮半島南部の新羅、百済、伽耶の遺物には見られない。これは注目に値する現象である。

註

- 1 田立坤、李智：「朝陽発現的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1994年11期。
- 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王子墳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発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97年11期。
- 3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朝陽地区博物館等：「朝陽袁台子東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6期。
- 4 于俊玉：「朝陽三合成出土の前燕文物」『文物』1997年11期。
- 5 註1。
- 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57頁46。
- 7 滋賀県教育委員会：『滋賀県史跡調査報告』第十二冊50頁第二八図。
- 8 日本馬具大鑑編輯委員会：『日本馬具大鑑一・古代上』日本中央競馬会発行。
- 9 この資料は、筆者が1998年に日本の福岡へ見学に行った際に所見。『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記念文集』334頁、図八：2は写真に基づいて描いた。
- 10 註1。
- 11 陳大為：「遼寧北票房身村晋墓発掘簡報」『考古』1960年1期。
- 1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等：「朝陽十二台郷磚廠88M1発掘簡報」『文物』1997年11期。

- 13 註3。
- 14 註1。
- 15 孫國平、李智：「遼寧北票倉糧窖鮮卑墓」『文物』1994年11期。
- 1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等：「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2期。
- 17 註8。
- 18 石山勲：「九州出土の環鈴について」『古代探叢—滝口宏先生古稀記念考古學論集』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
- 19 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属博物館：『大和の考古學』1999年。
- 20 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斑鳩藤の木古墳概報』吉川弘文館、1989年。
- 21 蘇哲：「日本藤之木古墳出土馬具紋裝飾初探」『考古學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またA、B、Cの3通りの観点も蘇哲氏からの引用である。
- 22 王巍：「从出土馬具看三至六世紀東亞諸国的交流」『考古』1997年12期。あわせて、以下を参照のこと。A楊泓「中国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对外影響」『文物』1984年9期、B董高「慕容鮮卑、高句麗、日本馬具之比較研究」『文物』1995年10期、C田立坤「三燕文化与高句麗考古遺存之比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
- 23 註21。
- 24 田立坤：「論銑具的型式及演變」『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1期。「三燕文化与高句麗考古遺存之比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
- 25 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再認識」『文物』2002年9期。田立坤：「三燕文化墓葬類型与分期」『漢唐之間文化芸術的互動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6 註21。

* 段注によると「亦」は「赤」の誤り

** 「昔、東晋の名家の王導・謝安の屋敷にいたツバメが、普通の民家に飛んできた」の引用

【図出典】

- 図1-1：十二台M9001出土鉄製鏡板『文物』1997年第11期、p.15、図三一、1。1-2：三合成墓地出土金銅製鏡板『文物』1997年第11期、p.45、図八、1。1-3：日本新開1号古墳出土金銅製透彫鏡板付轡『滋賀県史跡調査報告』第十二冊、p.50、第二八図。
- 図2-1：日本奴山123号古墳出土鈴付銑『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p.334、図八、2。この図は、筆者が福岡に見学に行った際の写真をもとに模写したものである。2-2：喇嘛洞墓地出土鈴付銑『文物』1994年11期、p.24、図一三、1、図一四。2-3：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銅製鑾鈴『文物』1997年第11期、p.25、図一三、3。2-4：北票収集銅製鑾鈴『文物』1994年第11期、p.23、図一〇、1・2。2-5：倉糧窖墓出土三鈴環『文物』1994年第11期、p.40、図七、4。2-6：喇嘛洞ⅡM217出土四鈴環『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p.230、図二二、3。2-7：日本小田茶臼塚古墳出土四鈴環 甘木市教育委員会『小田茶臼塚古墳』図版二五、3。
- 図3-1、2：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金銅製磯金具『文物』1997年第11期、p.27、図二〇、3、図二二。3-3：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海金具）『文物』1997年第11期、p.28、図二五。
- 図4-1～3：三燕文化の銑具（A型）『文物』1994年第11期、p.25。図一七、1・3、p.34図二、3。4-4、5：高句麗地域の銑具（A型）『丸都山城』p.94、図五一、5、『五女山城』図版五三、9。4-6、7：高句麗地域の銑具（B型）『考古』1979年第1期、p.30、図六、7・18。